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民族融合与分化研究

李晓斌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论文对这一时期的由文化交流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民族融合、民族分化现象进行了论述,运用文化学、民族学的理论对其原因、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经济、文化、人口数量、地理等因素在引起文化交流形成文化冲突、民族分化、民族融合等连锁反应中的意义与作用。

关键词: 文化交流; 文化冲突; 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途径由单一向多样的发展转变,通过民族迁徙,经济交往、移民等多种途径,云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随着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引发了文化冲突、民族分化、民族融合一系列连锁反应。

一、文化冲突

根据文化类型理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将经过家庭、群落(村落、社区)和国家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别,家庭的整合水平最低,国家的整合水平最高。对社会文化整合水平越高的文化,在文化交流、涵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震荡越强”。[1]西南夷各民族群体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西南民族群体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如滇王,其所统治的地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这样,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文化冲突。这一时期的文化冲突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 汉族移民文化的传播引发的文化冲突

两汉间西南夷的一系列反抗纷争其实质就是汉族移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原住民文化——西南夷文化发生的冲突。具体而言,体现在几个方面:(A)由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引发的文化冲突。两汉时期,西南夷中的奴隶制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西南夷各族内部的奴隶主先后起来进行掠夺财富和奴隶人口、土地资源的的活动,以发展奴隶制生产方式,扩大并巩固奴隶主的统治。《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说“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蓼。鹿蓼人弱为所擒获”。《后汉书·西南夷·邛都传》也说“豪帅放纵,难得制御”。这种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得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土地。封建制生产方式发展不充分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在当地统治的稳固,也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从西汉中期,为了进一步加强汉朝的统治,汉统治者力图以封建制生产方式来制约奴隶制生产方式,用内地的统治方式来对仍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地区进行统治。这主要通过二种方式来进行:(a)遏制奴隶主掠夺人口、土地的活动。(b)对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地区加重赋税征收。由此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线。《后汉书·西南夷·邛都传》说“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因郡县赋敛烦数,引发“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再如《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32年至前7年)汉政府为阻止夜郎王、句町王、漏卧侯兼并土地、掠夺人口的战争,诱杀了夜郎王

兴，由此引发“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二十二邑反”。(B)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引发的文化冲突。

西汉两南夷的反抗主要集中在洱海地区，在镇压过程中，往往有捕获大量牲畜的记录。《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公元86年）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这说明在洱海地区，畜牧业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类型。

在汉朝统治势力相对薄弱而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并以畜牧为主要经济文化类型的洱海地区，“前者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强加于后者，当压力未达到压倒之势时，反涵化的活动就会产生”，[2]因此，以定居农耕式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进入必然成为冲突的诱因。在两汉西南夷的反抗中，西南夷不仅“杀长史”，而且“燔烧邑郭”，“燔烧民舍”“剽略百姓”表现出对整个汉移民群体及定居农业文化的极端对立，这都使这场反抗斗争带有了很强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的色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汉间朱提区域见于纪录的反抗事件较少，见于记录的仅有《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六月，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破平之”。这一方面是因为朱提地区有较多汉民、僰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汉末年，文齐为犍为属国都尉时就在朱提发展农业。《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条载：“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由于汉民、僰人较多，朱提地区的农业发展较快，《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治朱提县，州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由于朱提地区农业的发展及农业作为主导经济文化类型地位的确立，使“夷”人畜牧业只可能以副业的形式存在，不可能形成文化冲突。并且，文齐在朱提采取的措施应该与他在滇池地区采取的措施有很多相似处，如果也象在滇池一样“降集群夷”役使“夷”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话，则“夷民”更被牢固纳入定居农业的经济文化类型中，如此，更不可能产生冲突。

（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秦汉之际，分布于洱海区域的昆明族开始向滇池区域迁移。昆明族是“随畜迁徙，毋长处”的游牧民族，当他们接近滇池区域时，遇到了由越人建立的强大的滇王国。滇国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激烈冲突，其结果是延绵不断的战争。“滇人和昆明人各有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时常为争夺滇东地区的生存空间，不得不进行一切无休止的战争”。[3]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僰人南迁。南下的僰人很大一部分迁到了滇池地区，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越人发生过冲突。他们与越人的关系显然比较融洽。其中原因主要是：僰人虽为氏羌民族，但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很早就接受了农业文化。这使他们与越人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因而在向滇池地区的渗透过程中，与越人产生冲突的程度较低。

二、民族分化

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百越，氏羌两大民族群体开始分化。这一时期民族分化主要是由民族迁徙引起的。迁徙打破了民族地域界限，使民族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大，使不同民族交错杂居，也使同一民族分散于不同地区。在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或是由于与不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导致文化差异出现，最终产生民族分化。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名称上的分化。秦汉时期，分布于云南不同地区的百越系统民族群体出现了不同名称，如僚、鸠僚、滇等名称。各个越人群体“与其他地区原属百越系统的其他群体，已

经是有所区别，但区别不是那样明显，而且相互之间也仍然存在许多共同之处”。[4]氏羌系统的民族也一样，《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称呼的变化正反映了同源民族的分化。

其次是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分布在邛都地区的叟人与蜀郡的汉族联系较多，所以武帝建元六年设县时，就附属于蜀郡，直到元鼎六年才单独设立越嶲郡。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的叟人在汉族影响下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此外，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笮、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设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则氏羌系统中的笮、冉与蜀也有密切联系，因其如此，笮、冉也部份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特性形成半耕半牧的类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而同为氏羌系统只是分布于“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的嵩、昆明却仍然保持着“皆编发、随畜迁移”的游牧民族的特性。由于经济生活是民族文化中最基础的组成成份，对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有较强的塑造作用，一定程度上，有什么类型的经济生活就有什么类型的民族文化。因此，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的差异已经为以后的大分化做好了准备。

再次，民族的分化还直接体现在这一时期郡县设置的变化上。“郡县区划，就是部族区域，”[5]则两汉时期郡县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族群的变化。从西汉在云南地区设置益州郡到东汉在云南增设永昌郡再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两汉基础上设置南中七郡，这种郡县的分置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族不断分化的情况，又从政治上肯定了民族分化的结果。

三、民族融合

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民族融合呈现出不平衡性。

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东部地区和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民族融合具有不平衡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a、滇西北的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为主；滇东地区的民族融合以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为主。b、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的涵化程度不深；东部地区的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实现了较深的涵化。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经济生活为本民族文化体系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物质供应上制约和影响文化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对文化体系的整体特性具有很大的塑造能力，因而，两个不同文化体系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异同直接决定着在这两个文化体系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及难易程度，换言之，经济文化类型相似的群体更容易相互适应，文化的互相借用数量更大，涵化更深。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主要分布着氏羌体系的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业；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主要分布百越系统的越人和氏羌系统的僰人，他们都从事定居农业。这两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与汉族移民文化接触后产生不同反应，造成不同结果。滇西北的经济文化类型与汉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差异大，因而该地区少数民族与汉移民涵化不深，文化冲突较多；而滇中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汉移民的经济文化类型相似，因而文化冲突较少，移入汉移民也较多，与少数民族涵化较深。

另一方面，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起，中国古代的传播体制就确定了一元的格局。[5]即封建官僚体系不仅成为政治权力运行系统，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文化信息的传播网络和通道。汉代，统治者利用这一通道整齐风俗，传播汉文化。教化作为官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官员任内的重要事务。从一郡太守至乡亭小吏都积极推行教化。这样从上至下都遍布了推行教化的人。“经过两百多年的移风易俗的过程，使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采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7]云南则不然，由于实行羁摩政策，汉政府封“西南夷各族内部存在的一些奴隶主、部族贵族为王、为侯、为邑长，使他们保持住原来的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按照旧存的统治方式去统治其本民族人民。从内地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们的统治，则是通过这些土著的王、侯、邑长们来进行”[4]这使在西

南夷地区的汉文化的传播不如内地直接方便。因此，在两汉期间，羁縻政策使汉文化的传播失去了一条畅达的通道，使文化交流只能局限于汉移民集中、汉统治力量相对较强的政治中心地区。这造成：汉移民较少、少数民族力量相对强大的滇西地区，在与汉族移民进行文化交流及涵化方面明显不如汉移民较集中、汉统治力量相对强大的滇东地区。两汉时期造成的这一结果继续对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的民族融合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是以大姓为中介进行的，由于两汉时进入滇西地区的汉民较少而未能形成强大的大姓势力，从而再次造成滇西地区与滇东地区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进程不平衡的发展。

其次，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迁入云南地区的汉民数量有限，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因而在这一阶段的文化涵化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汉移民较多地丧失他们的民族特性，变服从俗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但是，这一涵过程并非是单向的汉移民被夷化的过程。汉移民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其涵化功能。

汉族的移民文化隐去其庞大精深的主旨，以一种非本质面目来适应少数民族文化使其能跻身于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圈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涵化的功能。达到这一目的，汉族移民文化主要是采取与少数民族巫文化相结合来实现的。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是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巫、史、祝、卜起源为与巫文化的结合留下了沾附、交流、互补的基础。在汉、巫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汉族移民文化借助于少数民族巫文化的形式实现了自身的世俗化（或者说民族化），也突出了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通之处。此外，汉族移民文化强调了少数民族巫文化中所缺乏的特定内容——等级性，《华阳国志·南中志》即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人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这不仅适应汉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也适应已产生阶级分化的少数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汉巫文化的整合，这种带有较多夷文化色彩和一定汉文化因素的混合型文化更利于传播。于是在有关云南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汉文化与少数民族巫文化（如鬼教夷经）相结合的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雍)闾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再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粲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论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在汉、巫文化整合过程中，汉族移民文化实现了巫化，少数民族巫文化中也带有了汉文化因素，相应地在汉移民被夷化的同时少数民族也因其文化中吸纳了一些汉文化特质而产生区域性涵化，特别是对汉移民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工具等文化特质的吸纳。因此，这实质上是一个以汉移民夷化为主的文化涵化过程，“两个不同文化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2]

通过涵化，这部分与少数民族产生涵化的汉移民和这部分与汉移民产生涵化的少数民族共同融合为一个不同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群体。在这个民族群体中，以滇中、滇东地区在大姓统治下的汉移民和僰人为主，也有共同分布于这一地区的一定数量的叟、昆明人。他们共同在大姓统治下，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而很难区别了。《隋书·梁睿传》中梁睿上说：“南宁州多是汉人”，《太平御览》引《唐书》两爨条也说“俗多华民”，而《南齐书·州郡志》宁州条则说：“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说“齐民甚少”是因为汉移民夷化，汉户消失与僰人融合之故；说“俗多华人”则因为少数民族对汉文化有一定程度吸收，他们吸收一些汉文化特质后；其经济、文化与其他民族群体有了差异而与同区域的汉移民共同性增强并共同成为汉族大姓统治之下的爨人。因此，这两种矛盾的记载正说明了夷汉相互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关系密切而难区分，只能用爨人来称呼这一正在融合中的民族群

体。

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除了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发生。如劳浸、靡莫与滇的融合。

根据史料分析，劳浸、靡莫是叟人部落[2]分布地区在今滇东北一带。1936 年在昭通发现东汉的汉叟邑长印表明，这一地区在汉代已有叟人居住，因而劳浸、靡莫有可能是这部分叟人的先民。虽然是叟人部落，但他们正处于滇国势力范围内，与滇国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乃至司马迁在对西南夷君长作划分时，把他们与滇划作同一类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经济文化类型上也都是“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在政治上则“同姓相扶”。这说明，在滇国统治下，部分劳浸、靡莫的叟人吸纳了很多越文化特质，如定居、农耕，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 [1]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2] 黄淑婷，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3]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M]。云南：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 [4] 尤中，云南民族史[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 [5] 方国瑜，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A]，方国瑜文集[C]。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
- [6]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7] 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国风[J]，中国文化研究 1997 年冬之卷。

Research on Fu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Yunnan's Nationalit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Qin, Han, Wei, 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Li Xiao-b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650091)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serts cultural conflict, national fusion, na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itiated b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period. The reason and process of these appearances were analyzed with theories of culturology and ethnology. And the signification and role of factors of economy, culture, population, geography during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re also approached.

Key word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conflict ; national fusion

收稿日期: 2003-06-

作者简介: 李晓斌(1973-), 男(白族), 云南昆明人。史学博士,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 晓斌)